

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论演化及其限度

王大桥

摘要: 中国语境中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于 20 世纪前期主要在神话和歌谣研究领域进行人类学方法的尝试,新时期以来,在现代人类学及后现代相关理论的影响下,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到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实践表明,文学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具体表现为跨文化比较、原始主义、语境主义以及田野调查等方法的提出和应用。人类学从研究不同文化的“普遍性经验”到“地方性经验”进而充分考察“个体性经验”,文学人类学据此可以进行新的方法论尝试。

关键词: 文学人类学; 跨文化比较; 原始主义; 语境主义; 田野调查

作者简介: 王大桥,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文学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研究。本文为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12LZUJBWYB023] 的阶段性成果。电子邮箱: daqiao_wang@163.com

Title: On the Methodological Evolution and Its Limitation of Literature Anthrop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ritical survey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in Chinese contex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China, the main areas of investigation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are myths and ballads; during the Post - Mao Period, literary studies from 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expand to literary texts and cultural text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Practices in the above two periods show a consistent interest of research in the approaches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which evolves into the methods of cross - cultural comparison, primitivism, contextualism and field study etc.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the reflection on the potentialities and limits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literary anthropology; cross - cultural comparison; primitivism; contextualism; field study

Author: Wang Daqiao,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with academic interests in literary theory, literature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 Email: daqiao_wang@163.com

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程。在比较文学倡导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发展壮大。人类学与一系列西方理论的相互激发,共同构建了中国语境中文学人类学研究所需要的理论基础。20 世纪前期主要在神话和歌谣研究领域进行人类学方法的尝试,新时期以来,文学人类学在包括实验民族志及后现代相关理论的影响下,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到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实践表明,文学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具体表现为跨文化比较、原始主义、语境主义以及田野调查等方法的提出和应用。跨文化比较和原始主义着力于文学

的“普遍性经验”,语境主义强调文学的“特殊经验”,田野调查更多指涉文学的“地方性经验”,但文学的“个体性经验”被漠视了。选择方法论作为考察视角,便于厘清文学人类学真实的“历史发生”和暂时的“学术理想”。

一、跨文化比较

神话是文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共同领域,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首要发生地。弗雷泽、泰勒以及安德鲁·兰的神话研究成就,代表着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兴起、发展与繁盛的三个重要阶段。人

类学派神话理论本土化过程中,神话的文学之维在中国神话研究中逐渐敞开,文学史的书写直接通达神话。^①立足于材料意义上的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法是人类学派神话研究的主要方法。对于材料搜集的重要性,哈特兰德说“人类学方法便是将许多同类的民间故事归纳起来,基本工作便是要多多搜集材料;因为相关的事搜集得愈多,归纳的结果一定也愈准确”(17)。建立在材料基础上的比较强调共同点,并据此对材料进行选择,她说“一定要搜集许多相同的故事以考察人性的同点,社会情形及其他情形的同点。因为要想知道人类的通性,思想的方法,野蛮人种的制度,必须深入地研究,在杂乱不同的情形中找出共通点来”(33)。哈特兰德所言的材料搜集和归纳,最终要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获得研究的结果,比较法因此就成为人类学派神话研究的核心方法。郑振铎、周作人、茅盾以及闻一多等学人在神话研究中引进了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古今中外的材料进行综合比较,扩展了神话研究的文学之维。

周作人运用主题类型学和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本土的神话和童话故事的产生、范式和演变,认为人类学派的比较方法可以解释以下现象“如在一国见有显是荒唐怪异的习俗,要去找到别一国,在那里也有类似的习俗,但是在那里并不荒唐怪异,却正与那人民的礼仪思想相合”(“杂学”12)。他认为《蛇郎》童话与欧洲“美与兽”童话同为“物婚式”类型,物婚式中人与兽结为配偶,北美的人与蛇匹和中国盘瓠之民都是类似的神话传说。中国的《老虎外婆》系“食人式”故事,他举证希腊、日本等民族都有此说,共同的原因是因为“异族相食,本于蛮荒习俗,人所共知,其原由于食俭,或雪愤报仇,又因感应魔术,以为食肉者并有其德,故敢啖之,冀分死者之勇气”(“童话”34)。周作人把《吴洞》故事归于故事类型中的“灰娘式”,并且以德国、法国等“灰娘式”故事对此进行比较论证。茅盾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与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相遇,通过比较希腊、北欧、埃及以及印度神话的异同,尝试回答中国神话的保存问题。闻一多拓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用现时存活于边疆少数民族中的文化现象,参证和解读古代的神话,为“以今证古”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神话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试图在遥远的时空中寻求神话材料的同一性,脱语境的文本化倾向在实际的操作中难以避免。当丰赡的材料基于一种假设或解释拢集在一个语境中的时候,同一性的诱惑拒绝了对材料所携带的人类特殊经验的关注。清洗掉材料所携带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经验,对神话所作的同一性解释会因此变得可疑。不过对于文学人类学来说,它有机会修正这个问题,语境主义和田野调查就可以弥补跨文化比较方法的不足。

20世纪早期的歌谣研究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生长过程。人类学视野中的歌谣研究和文学视野中的歌谣研究虽有多方面差异,但是比较方法的运用却是共同的。民间文化中蕴藏的丰富民俗事项在相异民族和地域中存在相似相近现象,其跨越时空的雷同性、交叉性、重现性和流变性导致“比较研究法”在歌谣研究领域中广泛使用。刘半农说“所谓比较,即排列多数之歌谣,用研究科学之法,以证其起源流变。虽一音一字之微,苟可讨论,亦大足增研究之兴味也”(3)。胡适推崇比较方法,他说“研究歌谣,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较的研究法’,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歌谣”7)。胡适的比较法侧重共时性研究,历时性研究提及不多。溯源式的历时性研究,试图通过对某种母题歌谣的研究,探出其最初的形态、发源地和起源时间。胡适等学人提倡的比较方法主要在歌谣语体之内,杨世清却强调同一母题在不同民间文学语体之间的比较“现时歌谣与弹词唱本,都不妨就其形式性质相近的,拿来比较一下”(19)。跨语体比较的提出拓宽了歌谣研究的可比性视域。

相异于不同地域、历史和语体之间的比较,常惠强调歌谣研究的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学术的研究当采用民俗学的方法,先就本国的范围加以考订后,再就亚洲各国的歌谣故事比较参证,找出它的源泉与流变,次及较远的各国其文化思想与中国无甚关系者作为旁证”(2)。刘半农直承常惠所思,在留学巴黎期间,搜集流传于异域的中国民歌,并尝试与其他国家歌谣进行比较研究。

朱自清曾把董作宾《看见她》所采用的比较方法理解为中国学者的独立发现。^②考虑到比较方法在民俗学中的成熟运用是在西方影响下展开的,我们可以把朱自清的夸饰之词理解为对比较

方法的重视,而不是严格的学理判断。即使在民俗学视域中理解歌谣,依然没有办法剔除人类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也许董作宾在比较研究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涉及到国学的训诂、方言考订等,但正如董作宾所承认的那样,其比较视野的获得来自胡适的启发。无论“暗合”还是“因袭”,董作宾“看见她”研究的比较方法对民间文学研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在比较的视野中贯彻了历史演进的研究方法,“母题”的引入以及“历史演进法”的具体运用使得歌谣研究获得了稳定的方法支撑。

多重证据法是新时期以来文学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贡献。其跨文化比较视野特别重视研究所需的材料证据:从材料的载体形式看,无论是文字、口传、图像和实物等都可能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从材料的来源看,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民间活态文化等都可能是学术研究关注的对象;在材料的时空关系上,中外古今等都可以纳入到考察的范围之内,人类文化的边界就是多重证据法获取材料的边界。在多重证据法所涉的材料中,异域材料的进入是建立世界眼光的重要条件,叶舒宪说“用外国的、世界的东西来论证中国的情况,这对于坚守‘夷夏之防’,笃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国学传统而言,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人类学》10)。多重证据法希望在中西“会通”中获得“世界眼光”并且拥有“中国学问”。

跨文化比较可以叩开中国传统文学资源新的思考向度,中国文学的特殊经验被整合进人类整体的文学经验中,神话、歌谣以及古籍所蕴含的文学性因素因此获得新的世界性意义。但是比较的可操作性要求简化可比材料中所携带的特殊文化经验,材料被迫相互“文本化”。面对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论困境,勘察用来比较的材料所生成的具体文化语境或者尝试重返文化原点也许有效的脱困选择。

二、原始主义

“原始主义”最初用来命名一种文学创作倾向,后被指认为文学批评范式,再普遍化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演化路径清晰可辨。作为特定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原始

主义以“原始”来批判现代文明是其主要特征,所以凡是与原始主义这一独特角度有关的文学现象和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原始主义文学。原始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研究和评论具有原始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品与现象,同时也指涉原始以及与原始主义话题相关的特定批评视角。原始主义批判因此兼具“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两种功能,对于原始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人类学的内在联系,方克强认为原始主义文学批评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野,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吸纳了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挪移了文化人类学的价值观,并且参照了文化人类学的目标(“原始主义”95-101)。这样看来,原始主义文学批评在整合人类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就具有了“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意义。

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实质,就是运用人类学的视野、方法和材料审视文学,神话原型批评和原始主义因此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以从批评对象、批评方法和批评目标三个方面考辨两者的异同:“前者以超现实的想象为特征的神话类作品为主,后者则以反映文化困惑及其现实冲突的写实类作品为主;前者注重从远古到现代人类在文化心理上的连续性,后者则强调原始与现代对立的人类文明的阶段性;前者揭示作品在显现原型方面的永久性价值,后者则评论作品在返归原始意向上的现实性意义。两者差异与互补,使文学人类学批评具有更大的内在活力和发展潜力”(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12-13)。在20世纪前期文学人类学的“前史”阶段,鲁迅的神话研究就集中表明了原始主义研究倾向,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的寻根文学和西方当代寻根文化思潮研究中,原始主义展示了独特的方法论意义。

作为从开天辟地至今的完整故事,神话开始了对世界的统一解释。鲁迅接受了人类学派神话起源学说的观点,认为“昔者初民”在“变异不常”的“天地万物”面前要缓解困惑获得生命意义,只有“自造众说”开始对世界的整一理解,把事情发生的原因指派给“出于人力所能以上”的超自然力量或某种生物(《中国小说》19)。鲁迅意识到“神思”在神话发生中的作用,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闕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65)。《破恶声论》亦云“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

瑰大之”(32)。古民“神思”所催发的想象力建立了不同事物之间的非因果关联,这种理解方式被指称为感应思维或者感应认知,弗雷泽所称的巫术“同一律”或“互渗律”、维柯理解的“诗性思维”、列维·布留尔所言的“原始思维”和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野性思维”,同样依赖于现象间的种种感性联系,世界拥有秩序从而获得理解。

对神话发生所作的原始主义解释,并不是鲁迅的发明。不过,以神话为题材创作短篇小说,对先秦神话进行创造性转换,从而再造民族原初生命力,却是鲁迅神话研究的个人特色。他把女娲抁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故事写入《补天》,把后羿的故事写入《奔月》,把大禹的故事写入《理水》,并非为了恢复神话的原貌,而“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鲁迅,“我怎样”527)。在鲁迅的理解中,开端所隐含的本源性价值直指民族的原初生命力。但神话材料中并不现成地摆着一种叫做“原初生命力”的东西,这需要能够穿越常识和理性的设定,才能瞥见被遮蔽最深、遗忘最深的本源性存在的原初生命力。廖诗忠认为,鲁迅回归先秦文化源头,是由于“新生”思想的内在困境所引发的,民族“新生”最后落实在民族“新人”的历史生成上。被长期遮蔽的民族原初生命力是“新人”产生的历史之源,唤醒民族原初的生命力需要归源之思,“它将向外求取的工作转换成了向内接引,使‘新生’由外力促迫转变成民族内部文化‘再开端’的自我更新运动。鲁迅文化归源之思的第一站便是先秦神话,这是由神话的开端性地位所决定的”(廖诗忠91)。选作小说主人公的三位神话传说人物女娲、羿和大禹,均是生命力充盈丰沛并且创造了丰功伟业的神或英雄。

新时期文学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民族文化遗产,确认民族身份和恢复传统记忆。有感于民族文化的断裂,从1985年开始,一批作家相继发表文章提出文化寻根,强调文学的文化底蕴和民族色彩。他们的态度,多少受到返回神话和原始主义文化思潮的外来影响。寻根文学反映了现代人在原始与现代相联系、中外各民族相比较的人类文化大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选择,文化人类学日益显示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和独到性,于是寻根文学热推动了文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克

强论述了文学人类学的批评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原始与现代相联系、中外各民族相比较的宏观文学视野和研究态度”(《文学人类学批评》6)。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归纳和思考,虽然没有在理论的内在逻辑上进一步论证,但也恰恰因为来自于批评实践中的经验感受,使得这条批评原则保有了现实针对性及其理论活性。

从2000年发表论文《从〈金枝〉到〈黑色雅典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寻根》(《寻根》2000年第6期)到2009年出版专著《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山东教育出版社)这段时期内,叶舒宪对西方文学寻根大潮中的“原始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理论、材料、方法到学术伦理等多个方面拓展了原始主义批判内涵。他认为20世纪以来的全球文化寻根与文化再认同分别在以下几个层面展开: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白种族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主义的复合性价值体系,当代文化寻根运动者反思和批判的锋芒也主要集中在种族、地理、历史观、性别、宗教诸方面(叶舒宪,“新启蒙”99-104)。叶舒宪分专题研究了西方文化寻根运动的“黑色风暴”、“凯尔特复兴”、“女神复兴”、“东方转向”、“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六大分支。他的研究强调了认识异文化的新方法:借鉴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式,摄入个人的实地考察和体验,特别注意从各种边缘的或非主流的、非官方的、非学院派的亚文化视角去发现和审视问题(“文化寻根”42-50)。另外,文化寻根所具有的重新滋养的治疗学意义也得以强调。

对原始思维和原始文化的向往,意味着在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伦理所支配的现实世界之外构建能够安放心灵的文学世界和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充满诗意与幻想,连接着人与万物之间原初的亲缘关系。原始主义给了处于复杂社会转型中的人们许多超越和逃避现实异化的乌托邦式期许,作为现代文明的反思性话语有其强大的批判力量。原始主义假定人性是堕落的,这种堕落与人之为人的制度性条件相关,因为人是制度创立过程的结果和产物。圣·奥古斯丁代表着基督教关于堕落的观点,认为人的原初状态是由《圣经》神圣揭示的状态;卢梭代表着浪漫主义的态度,把人原初的前社会状况视为从人当下的自然本性推断出来的想象的可能性。原始主义执着于人类遥远

的过去,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需要,可能还蕴涵着某种深刻的伦理关怀。

三、语境主义与田野调查

将文本(text)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context)来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可称为“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语境主义把注意力从经典文本转移到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中,强调文本与特定文化与历史影响之间的关联。从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文学人类学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展现其“语境主义”的方法论特点,具体表现为三种语境“还原”:其一,历史语境还原,闻一多的《诗经》研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以及多重证据法等研究多有体现;其二,文化语境还原,20世纪初期的歌谣运动以及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强调的“田野调查”,呈现出经验主义和语境主义的研究特点;其三,人类学意义上的还原,把研究对象还原到人类共性的文化语境上,在神话原型批评中不难发现这种研究方法。向下还原的语境主义追求人类文化经验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向上还原的语境主义强调的却是人类文化“经验”的连续性和全球性。不过,语境主义忽略的是文学研究中人类“经验”的个体性,即作为个体的人是如何“经验”人类的文化经验的,现代人类学和实验民族志研究中所涉的自我情感和审美偏好等感性内容在语境主义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20世纪前期以北大为中心的谣运动,顾颉刚“用历史的眼光看历史,用传说的眼光看传说”(顾颉刚247),确证了杞梁妻的故事确实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杞梁妻又变成了孟姜女。许冠三指出顾颉刚的方法系统由三大源流构成:一是得自胡适的“历史演进的方法”,二是此法的变种——“故事的眼光”,三是源于康有为但经他发展的“伪”史移用法。这三种方法每每错综并用,但始终以演进法为主(106)。而在胡适看来,“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古史”194)。何止古史上的故事,所有流传久远的故事、传说乃至与此相关的小说、诗歌、戏剧等,都可借重这一方法。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到“用历

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胡适对历史演进法的方法论内涵做了归纳和概括:

1. 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 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 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 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古史”193)

历史演进法的要义在于把古史传说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杨宽曾对胡适的古史传说演进的方法提出了商榷,认为胡适提倡的“历史演进方法”偏重于时间性之考察,而忽视地方性的考察,因此是片面的。^③而顾颉刚孟姜女研究对地域的排列以“山东”开头“江苏”结尾,地方语境的考察系统因而明确。

闻一多通过对古籍材料与田野调查材料的综合分析比较,对高唐神女、姜嫄履大人迹神话、人首蛇身神、伏羲女娲兄妹配偶婚、战争与洪水遗民神话、图腾社会与图腾神话等做了精细的研究。他力图还原神话和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因为作为方法论基础的文化人类学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考古、田野调查、语义钩沉、古籍破译等具体方法,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原生态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回归历史现实中去阐释神话和文学创作,立足于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宗教习俗、道德伦理等“还原”神话传说之所以产生的历史场景。

在《风诗类钞·甲》的“序例提纲”中闻一多说,过去对《诗经》有三种“旧的读法”,即“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而自己所作的类钞,则是新的“社会学的”,并强调要依靠“考古学”、“民俗学”和“语言学”来“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去(“风诗类钞”456-57)。在《诗经的性欲观》一文中,其提供了“还原”路径“用研究性欲的方法来研究《诗经》,自然最能了解《诗经》的真相。其实也用不着十分的研究,你打开《诗经》来,只要你肯开诚布公读去,他就在那里。自古以来苦的是开诚布公的人太少,所以总不能读到那真正的《诗经》”(“诗经”170)。《高唐神女传说之分

析》是通过性欲理论从而通达原始语境还原的代表性成果,指出《诗经》中的“南山朝隴”和“姜嫄”、宋玉《高唐赋》中的“巫山朝云”、《楚辞·天问》中的“涂山氏之女”以及“宋桑林之神有猗氏简狄”,都是远古时期“生殖机能宗教”所崇拜的先妣。

闻一多对原始社会生活历史还原的路径还包括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图腾理论,通过图腾理论所提供的考查视角切入神话和文学研究。在《伏羲考》中,他系统地论证了伏羲女娲崇拜及其图腾仪式的演化过程,批评了传统的伏羲和女娲“既是夫妇,就不能是兄妹”的观点,提出“‘兄妹配婚’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伏羲考”59),揭示了从蛇图腾演变为龙图腾的演化进程,指出龙图腾是“化合式的图腾”。《伏羲考》运用了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论述,扩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叶舒宪把这种学术研究方法明确界定为“三重证据法”,即纸上材料(主要指文化典籍)、地下材料(主要指考古发现所得)与民俗和异域材料并重的三重材料运用(“人类学”10-12)。《龙凤》、《两种图腾舞的遗留》以及《端午考》诸文,都是借鉴图腾理论对中国文化中的核心神话及其仪式的研究。古代的实物和图像成为继“二重证据”说及“三重证据”说之后的第四重证据,叶舒宪的《熊图腾》是对第四重证据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尝试:在汉语书写文本的非常有限的记录之外去寻找新的直观材料,试图重构出一个失落已久的熊神崇拜传统的线索。叶舒宪强调从文本走向田野,将实物和图像等在传统文化链条上衔接不紧密的材料引进到多重证据法的研究中来,这种方法论努力是对材料“文本化”倾向的反拨。

在原型批评实践中,由于要确立文学作品中的“原型”,再把已经确定的原型与其他的作品或神话、仪式等联系起来获得解释和意义,所以得舍弃文学作品中的个体经验性内容,不断地对原型作人类学意义上的还原,直到原型的内涵指向仪式、神话、图腾、原始心理或集体无意识等等非个体的经验内容。还原的方法就是弗莱所倡导的“向后站”、“远观”的批评方法,藉此期望在众多的作品中归纳同一的原型意象或结构。在不断后退的考察过程中,个体性经验逐渐模糊最终让位于集体性经验、种族性经验、民族性经验,最后直

至人类性经验。

语境主义强调文学的“特殊经验”,田野调查更多指涉文学研究的“地方性经验”。20世纪初的“歌谣运动”,以《北京大学日刊》、《歌谣》周刊以及《晨报》的副刊等报刊为理论阵地,高扬被传统书写文化压抑的口头文化。截至1925年6月28号《歌谣》周刊停刊,歌谣研究会共收集歌谣13908首。在《歌谣》周刊上共选登出2226首歌谣(洪长泰79)。其中成果最丰首推情歌,其次是儿歌和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歌谣,还有很多描绘民间大众日常生活情境、自然风景的歌谣。抗日战争爆发后,学者们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少数民族神话田野考察,搜集了许多小型社会的口头神话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写成研究成果,如闻一多的《伏羲考》、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马长寿的《苗瑶之起源神话》等,开启了田野调查与书面文献相结合的神话研究形式。

人类如何“经验”世界是人类学和文学共同的关注点。新时期以来持续地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进行讨论,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的经典方法被反复强调。彭兆荣就认为,文学人类学既然冠以“人类学”的研究,就要有相应的“人类学性”,而“人类学性”的是否获得取决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文本”是否有“田野性”,田野作业的时空性质即要对对象的“曾经是”(been)到“现在是”(being)作过程考察(彭兆荣91-93)。基于人类学“田野性”的理解,彭兆荣所理解的文学人类学,是指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他所直言的“文本性”和“田野性”实际上是对文学人类学的过程性、参与性的强调。叶舒宪认为文学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与文艺学交叉的产物,毕竟不能像文化人类学那样以田野作业为中心。文学现象虽然可以从田野的“活性态”去考察,但更普遍的存在方式还是书写的文本(“文学人类学”84-86)。如何处理田野作业与文本作业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学人类学需要深入讨论的方法论问题。

注释[Notes]

①鲁迅首先提出并从理论上阐释“神话作为文学”的理论观点,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认“小说的渊源:神话”,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

芽”明确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周作人把神话当作文学来看,以希腊神话为中介,汲取了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材料和方法来研究神话。认为“神话是原始人的文学”,“对于神话拿研究文学的眼光看来,是有价值的,有趣味的”。矛盾因为要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接触到古希腊神话,继而扩展到欧洲神话和欧洲神话理论,最后转向中国神话研究。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之间建立联系,在古代典籍中追寻神话与诗的踪迹,试图还原原始的历史情境。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成为神话研究本土化的特色,延安时期的何其芳以及建国后的神话研究,神话研究的文学之维始终清晰。

②朱自清以董作宾的《看见她》和顾颉刚的《广州儿歌甲集序》为例,指出中国学者独立发现这一方法的可贵,他说“这个方法是最近才介绍给我们的,但我们十年来的研究却与此有暗合的”。详见朱自清《中国歌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30。

③他说“胡适尝分别考辨古史传说演变之方法为四步骤:(1)将每一事之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次第排比。(2)研究此一事在每一个时代有如何之传说。(3)探索此一事渐次演变之迹象。(4)遇可能时,解释其每次演变之原因。其方法偏重于时间性之探讨而略于地方性之注意,犹为未达一间!胡氏又尝分析古史传说之来源与演变之程序:(1)由简单变为复杂。(2)由地方的变为全国的。(3)由神话变为史实,由陋野变为雅驯。(4)由寓言变为事实。就中古史传说以神话变为史实一例最为普遍,古史传说之初相几无非为神话也。”参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07-108。

引用作品[Words Cited]

常惠“对伊凤阁来信的回复”,《歌谣》26(1923):2。

[Chang, Hui. “A Reply to Yi Fengge’s Letter.” *Ballad* 26 (1923): 2.]

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Fang, Keqiang. *The Criticism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2.]

——:“原始主义与文学批评”,《学术月刊》9(2009):95-101。

[———. “Primitiv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Academic Monthly* 9 (2009): 95-101.]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Gu, Jiegang.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Study of the Widow Meng Jia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4.]

哈特兰德“神话与民间故事”,《童话论集》,赵景深编。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

[Hartland. “Myths and Folk Tales.” *Collected Essays on Fairy Tales*. Ed. Zhao Jingshen. Shanghai: Kaiming Bookstore, 1927.]

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Hung, Chang-tai.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Trans. Dong Xiaopi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3.]

胡适“歌谣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歌谣》46(1924):7-8。

[Hu, Shi. “A Case Study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Ballads.” *Ballad* 46 (1924): 7-8.]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1册),周谷城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Reading Notes on the Debates on *The Ancient History*.” *Investigations to the Ancient History*. Vol. 1. Ed. Zhou Guche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2.]

廖诗忠《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Liao, Shizhong. *A Return to the Classic: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 and Pre-Qin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刘半农“罗家伦君与刘复教授往来之函”,《北京大学日刊》258(1918):3。

[Liu, Bannong. “Th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Mr. Luo Jialun and Professor Liu Fu.”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258 (1918):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Lu, Xun.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IX.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Breaking the Sound of Evil.”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VII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How I Started to Write Novels.”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IV.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
- [- - - . “On the Forces of Satanic Poetry.”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彭兆荣 “边界不设防：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文艺研究》1(1997)：91-93。
- [Peng, Zhaorong. “Borderless: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1 (1997)：91-93.]
- 闻一多 “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第 3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Wen, Yiduo. “An Investigation into Fuxi the Mythological Figure.” *Complete Works of Wen Yiduo*. Vol. 3.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3.]
- ：“诗经的性欲观”，《闻一多全集》第 3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 - - . “On the Sexuality in *The Book of Songs*.” *Complete Works of Wen Yiduo*. Vol. 3.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3.]
- ：“风诗类钞·甲”，《闻一多全集》第 4 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 - - . “On the Folk Songs in *The Book of Songs*.” *Complete Works of Wen Yiduo*. Vol. 4.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3.]
- 许冠三 “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顾颉刚学记》，顾潮编。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
- [Xu, Guansan. “Gu Jiegang: From Skepticism to Conviction.” *On Gu Jiegang’s Learning*. Ed. Gu Chao.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杨世清 “怎样研究歌谣”，《歌谣》纪念增刊(1923)：19-22。
- [Yang, Shiqing. “How to Study Ballad.” *Ballad Special Supplement* (1923)：19-22.]
- 叶舒宪 “文学人类学：田野与文本之间”，《文艺研究》1(1997)：84-86。
- [Ye, Shuxian. “Literary Anthropology: Between the Field and the Text.”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1 (1997)：84-86.]
- ：“新启蒙：文化寻根与 20 世纪思想的转向”，《天津社会科学》4(2005)：99-104。
- [- - - . “New Enlightenment: Cultural Roots and Intellectual Turn in the 20th Century.”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4 (2005)：99-104.]
- ：“文化寻根的学术意义与思想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6(2003)：42-50。
- [- - - . “On the Academic and Intellectual Significance of the Seeking of Cultural Roots.”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6 (2003)：42-50.]
- ：“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法的更新”，《书城》1(1994)：10-12。
- [- - - . “The Triple Evidence i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 Renovation of Textual Study.” *Book City* 1 (1994)：10-12.]
- 周作人 “童话研究”，《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
- [Zhou, Zuoren. “A Study of Fairy Tales.” *Zhou Zuoren’s Essays on Folklore*.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 ：“我的杂学·七”，《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
- [- - - . “My Miscellaneous Studies, No. 7.” *Zhou Zuoren’s Essays on Folklore*.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 (责任编辑：王 峰)